



MMS

Modern Media Studies

MMS, Vol. 1, No. 2, 2025, pp.224-234.

Print ISSN: 3078-3151; Online ISSN: 3104-50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2.06>



哀悼的三重面向：香港报纸文艺副刊悼文研究

张 宇 (Zhang Yu), 裴子骏 (Pei Zijun)

摘要：死亡，是个体生命的终点，也构成了社会文化叙述的重要契机。悼文，作为对死亡的回应，不仅承载着私人的情感，也进入公共语境构成社会记忆的一部分。香港报纸文艺副刊中所刊登的各类悼文，从“断裂”“记忆”与“继承”三个维度呈现着独特的叙述特征与文化意涵。文章认为，通过不同书写模式，悼文回应死亡带来的断裂性焦虑并呈现个体生命观念，同时，悼文更作为一种深刻的记忆实践，以怀旧的情感结构介入，参与到个体身份的构建与知识遗产的继承当中。应当说，香港报纸中刊登的悼文传达着个体生命的哀悼，也折射着香港社会在文化发展中的多重精神图景。

关键词：香港报纸；悼文；文艺副刊

作者简介：张宇，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zhangyu.nju@foxmail.com。裴子骏（通讯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Cole_PZJ@163.com。

Titl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ourning: A Study of Obituaries in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Abstract: Death is not only the end of individual life, but also a crucial moment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narration. As a response to death, the obituary—while bearing private emotions—also enters the public sphere and becomes part of social memory. The various obituaries published in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reveal distinct narrative features and cultural meanings throug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upture,” “memory,” and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rough diverse modes of writing, obituaries respond to the anxiety of rupture

brought by death and reflect on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as a profound practice of memory, the obituary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tellectual legacy through a structure of nostalgic sentiment. In this sense, the obituaries in Hong Kong newspapers not only convey mourning for individual lives, but also reflect the multiple spiritual landscapes of Hong Kong society in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Hong Kong newspapers; obituaries; literary supplements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u**, Specially Appointe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zhangyu.nju@foxmail.com. **Pei Zijun** (Corresponding Auth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Cole_PZJ@163.com.

引言

死亡，作为人类经验的终极地带，不可避免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而面对死亡，作为一种情绪的“哀悼”有着极强的私人属性，因其根植于个体与亡者之间不可复制的情感连接，原属于不可转述的心灵体验。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哀悼从未如其所愿，停留在个体私语的层面，千百年来，一整套的祭悼文化将哀悼制度化、仪式化。在这一文化谱系中，“哀而不伤”成为理想的情感表达方式，而原本私人的哀伤经过集体伦理的转化方得以表达——悼亡文本也在此意义上构成了一种针对死亡的修辞（周晓坤，2023, p.52）。进入近现代传媒语境后，报刊悼文再一次对死亡经验构成了特殊回应，其以一种更便于传播的文本方式对死亡展开叙述，于是就此将个体的消亡彻底抛入了可传播的、可再现的意义网络。换言之，报刊悼文具有的开放性进一步将哀悼的情感体验投入了社会性话语中，其中的私人情感与个体性回忆更通过报刊媒介的公开化、规范化处理后进入公共叙事，最终成为能够影响公共的新叙事。

在这样的意义上看，香港，作为近现代以来长时段处于文化中介状态的独特社会空间，研究其报纸文艺副刊中刊登的悼文文本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其文本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继承着传统对于死亡、哀悼、纪念的文化表述，又在另一方面承接了香港在近现代以来，在多重历史张力下形成的复杂社会心理。在这样的媒介与文本中，“哀悼”在私人与公共之间流动，书写死亡于是不仅仅意味着书写一个个体生命的终止，更关乎了如何书写生命、如何记忆社会、如何规整逝去个体思想遗产的完整思考。

一、断裂：死亡焦虑与悼文的书写模式

面对生命的终结，一种深刻的断裂感裹挟着死亡焦虑而来。这样的“断裂”，既是现实层面的时间中断，更是叙事层面上的意义中断。生命的终结不仅截断了个体存在的连续性，对于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亡者而言，更撼动了其在社会与集体记忆中占据的位置。“悼文的作者旨在恢复逝者在纪念中的缺席，但又永远无法恢复其存在”（Martin, 2022, p. 478），作者因此必须在哀悼与记忆、断裂与缝合之间寻找平衡，尽可能做到如实回应死亡带来的断裂感的同时，又在文字中构建出一种意

义的延续，以此既使生者安顿情感，又确定逝者在私人记忆与社会集体中的位置。而综观香港报纸文艺副刊中刊登的各篇悼文，可见四种常见的书写模式呈现出针对这一“断裂”的不同应对方式。

一种接近于中国传统“行状”书写模式的悼文旨在从死亡的“断裂”中重构连续性。传统祭悼文中的“行状”以史实性与礼制性为准则，其记述亡者的生平行迹，强调对其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并进行道德评价。香港报刊悼文中与之类似的是，这一书写模式下的悼文文本尝试系统性梳理逝者的生平事迹，以生命历程的整体性来“象征性”缝合死亡带来的断裂感。在《怀念父亲黄作梅》一文，黄伟健（1995）悼念自己幼年时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去世的父亲黄作梅。黄作梅逝世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伟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以：（一）聪颖好学，体恤孝顺；（二）热血青年，爱国向上；（三）为反法西斯而战斗；（四）创办新华社海外分社、负责有关工作；（五）为世界和平献身；（六）深深的怀念，六个副标题为结构系统勾勒父亲的生命轨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父亲去世时作者尚在襁褓，因此对于父亲生平的复原并非基于自身的直接生命经验，而是一种在缺席的基础上完成的生命书写，但是作者在逝者生命过程中的缺席非但没有削弱其书写的力度，反而凸显了一种更深层的追忆欲望。换言之，在某种无法抵达的经验“断裂”上，悼文以叙述的力量搭建桥梁，在不可记忆中重构情感与意义的连续。徐铸成（1941）的《悼念季鸾先生》则是一个更与传统“行状”模式接近的书写。文章极尽详细，同时作为张季鸾纪念特刊的核心，文末还附上了张季鸾的生平年表，生命叙事的线性结构因此意味更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状”所构建的完整生命叙事，有时并不等同于对被悼者做全部生平的重构，还有相当一部分悼文的作者乃是完全基于自身记忆与交往经验对被悼者展开的书写，如《怀念冯乃超》，该文写于2000年的悼文，意在追念1983年去世的诗人冯乃超。如作者林林（2000）所言，文章是“写出以上我与乃超交往的二三事以纪念”，因而仅仅聚焦于冯乃超1938年至1949年间的生活与创作经历。应当说，这类具有时期性的“行状”写作策略，也是传统悼文对逝者生平进行编年叙述的惯例延续，作者选择某个与自身相关的特定时期对被悼个体经验进行集中呈现，以此凸显出通过片段连续性的时间结构抵御死亡断裂的叙事努力。

与之形成对照，另一类悼文以片段式的“人物肖像”维持了死亡带来的“断裂”。在这类片段化的叙述中，作者呈现逝者的身影，记录存留于私人交往记忆中的零星瞬间与情感痕迹，这样的文本模式并不旨在复原被悼的生命全貌，而是在片段性的空白中凸显中断，呈现其带来的经验断裂。如《怀念诗坛泰斗艾青》一文，作者贾丹华（1996）虽与艾青同为诗人，然而交往经历十分有限，仅在部分研讨会的场合有过数面之缘，唯一一次深入交流是在《诗刊》副主编丁国成的引荐下进行的拜访。这为数不多的接触构成其悼念的全部素材来源，因此于他而言，书写印象及见面的体验必然成为核心支点，以此为基础展开叙述艾青对于自身在精神层面的认同与创作路径的塑造，最终借由这样一种具体而有限的片段，建构起一种微经验，深影响的写作模式。再如《世纪末文坛上的流星——悼念林耀德》，作者陈思和（1996）与林耀德交往联络较深，在文中记述了他们两三个交往的情景。作者谈到林耀德来到复旦大学演讲的滔滔不绝与锋芒毕露，也谈到与林耀德相熟后看到了他没那么有锐气的一面，他也担心自己成名太早受到误解。通过几个片段式的回忆，陈思和分析林耀德内心深层所具有的焦虑。文章最后对“流星”这一意象反复凝视，感叹“莫非他真有一点预感，他只是那世纪末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流星”，使逝者的生命在闪耀与消逝之间获得了一种模糊而富有诗意的象征意义，在这颇具断裂感的叙述中，文本不试图弥合裂隙，转而选择在裂隙间捕捉情感与

意义的余光，悼念由此在记忆的碎片中触及生命的哲思，又复归于一种怅惘而迷离的凝望。

此外，还有部分悼文采用主观性极强的随感式写作模式，在哲思中，在议论中，乃至在诗歌的形式中悬置死亡带来的“断裂”，绕开死亡的意义主题转而将个人情感延展。在这类随感式悼文的写作实践中，死亡的“断裂”成为其省思的契机，也因此，这一写作模式中文本情感密度高，文体颇为灵活，构成了香港报刊悼文中最具开放性与不确定性的一支。以陆离（1969）《敬悼左舜生先生》一文为例，全文近八成篇幅皆由作者陆离的随感构成，从一种焦虑的死亡预感谈起——“不知何时起总担心这位老先生那位老先生的去世”，继而过渡到对于哀悼本身意义的思索，甚至直言悼文的书写不过是“满足自己和满足其他生人”。作者与左舜生先生虽有师生关系，然文中抛却了所有仪式化的缅怀，转而在生活化的语气中展开，其文字如同漫谈，节奏自由，悼念在此流动的叙述中悄然完成。饶是如此，随感式的悼文以这样一种自我指涉的态度将悼文从传统纪念性的叙述转化为对于死亡经验的感性回应。此外，在这一写作模式中，还不乏以诗悼亡的作品，诸如碧野（1940）的《悼叶紫》，芮中占（1958）的《星的沉落——悼杨刚》，黄德伟（1993）的《悼顾城，也是悼诗》，何建宗（1993）的《悼蕴盈博士》，羊城（1993）的《生命的边缘行车——悼谢烨》等等都是相关典例。应当说，不论是采用的现代诗还是古典格律形式，由于诗歌自身在结构上具有的情绪流动性，诗悼的情感密度都达到了高度的浓缩。同时由于诗歌内部意象的拼贴性质，诗悼将属于被悼者的多重“断裂”元素以意象的形式组合，也因此悼念的核心就不在于重构意义，而在于以这样的诗性维持哀悼的“未完”本质。可以说，随感式的悼文不试图构建死亡以及亡者的确切意义，将哀悼的行为维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其书写逻辑不在于弥合死亡带来的“断裂”，而在于坦诚面对“断裂”的无解。悬置的“断裂”带来思索与情绪，使得哀悼成为一种流动的情感状态。

最后一类悼文表现出对于情感的严格克制，以学术性、理论化的策略展开纪念，并在此意义上构成对死亡“断裂”的学理性消解。作者往往有意将重心放置于被悼者的学术贡献、思想轨迹与专业影响中。死亡所引发的情感冲击被以理性化的方式处理，悼念不呈现为情绪的溢出，而成为学术谱系内部梳理的契机。作者爬梳逝者的专业成就，逝者则被归档进入知识的体系中，通过其思想的延续与学术成果的留存，实现一种个体终结与断裂的象征性修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本在有效淡化死亡“断裂”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消解个体的风险。被悼者的主体性以及作者的情感温度在这样一种去主体化的叙述中被压缩，于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哀悼本身具有的强烈人性维度与情感张力。关于这一部分其他相关问题将在后文的“继承”维度中展开分析，此处暂按下不表。

如上所述，香港报纸文艺副刊中的悼文文本在面对死亡所造成的时间与意义“断裂”时，展现出了多元而复杂的叙述策略。但无论是对于“断裂”的弥合、维持、悬置抑或象征性消解，在这些差异化的呈现中，悼文始终都是作为重要的书写实践来回应死亡带来的终极焦虑，并在其中重申个体生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张力关系。

二、记忆：集体记忆塑造与个人情感怀旧

悼文不仅是对死亡所带来“断裂”的回应，更关乎记忆的生产——其中包含着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两个部分。应当承认，记忆与死亡两者之间天然具有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因为死亡中止了个体经验的更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记忆进行侵蚀。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身份显得尤为脆弱，因其存续高度依赖着记忆的维持，当记忆本身在个体消失后受到来自时间持续不断的干扰，任何关于过

往历史的再现与个体身份的建构就必然带有了修辞性与重构性。在香港报纸文艺副刊刊登的悼文中，一类纪念着世俗意义上宏大而典范人物的“非即时性悼文”文本呈现出了鲜明的集体记忆建构与身份重塑作用，而另一类由平凡人写就，纪念着平凡人的“私人悼文”文本则以情感的“怀旧”在死亡带来的“断裂”下记述个人记忆。

所谓“非即时性悼文”，其失去了作为悼文发布媒介的报刊所具有的时效性，往往在被悼个体逝世一年及以上时间后发表。“非即时性悼文”写作的诱发离不开两种情况，其一是写作者在生活中经历了某种关乎被悼者的生活经历，以此再度引发对其的悼念；其二则更常见，是对颇有声望的被悼者进行的周期性纪念，通过对逝者的周期性回溯，这一类悼文唤起社会持续性的哀悼与记忆。在以上两种情况中，“非即时性悼文”的写作都使记忆的建构脱离了死亡这一事件本身，转而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是因此，悼文不停留于“哀悼”的情绪本身，而整理逝者个人生平与社会意义以最终塑造集体记忆的目的更为显著。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并且其总是由社会群体在当下的需求而重构过去（陶东风，2010），于是在此意义上，当悼文的书写脱离了私人的缅怀，其就转而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介入性的文化实践，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激活公众对逝者的再认再思。以下几篇以鲁迅为书写对象的悼文可以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典型案例。庄约（1939）在鲁迅去世三周年之际撰写《遥祭——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开篇即点出抗战期间“战争的迷雾”与“侵略者黑影”所构成的哀悼阻隔，使纪念行为被迫转化为“遥祭”。在时与空的断裂中，鲁迅被文本重新召唤为“不死的灵魂”，而其“伟大的影子”更成为动员现实行动与精神共鸣的象征性力量。由此纪念鲁迅的文本行为成为一种政治性记忆的再确认，也正如作者所言，需要“枪毙这弱性的阿Q”以不断召唤鲁迅所代表的批判精神与文化意志。同年，王健（1939）发表于《星岛日报》的《纪念鲁迅与提倡杂文》则借鲁迅周年纪念之名，对杂文文体的合法性进行申辩。文章将鲁迅明确定位为一位“杂感家”，借以回应文坛对于杂文体裁的质疑与争论。次年陈畸（1940）的《纪念鲁迅四周年忌》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象征性身份，其直面“和平文艺家”对鲁迅“尖酸刻薄”与“挟恨怀怨”的道德否定，强调其“战斗的精神”乃现代文艺家不可或缺的品质，借此确认鲁迅在战时语境中的文化正当性。同一时期，罗高（1940）的《中国的圣人——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同样聚焦鲁迅的杂文，既承认鲁迅语言的“尖刻”，又赋予其深层悲悯的伦理基础，借“尖酸的眼泪”反证其杂文具有的精神温度，完成了对鲁迅批评的重新阐释。而之后再到鲁迅逝世十二至十三年之际，其周年悼文开始承载新的时代语义，悼念在塑造鲁迅新的公众身份的基础上重构集体记忆。两篇诗悼在这一时期发表于《大公报·文艺》中，邹荻帆（1948）在鲁迅逝世十二周年之际撰写《跨过阿Q——纪念鲁迅》，提出“多事的阿Q已经压抑死了”，而次年破空（1949）的《人民心灵的救星》则更进一步将鲁迅喻为“人民灵魂的技师”。鲁迅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转型期再度被强化为精神楷模。杨子江（1950）的《谈谈鲁迅的翻译工作——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在之后的一年刊登，与前面的纪念悼文类似的是，其以鲁迅逝世十四周年为话题，展开对鲁迅翻译工作的梳理。在文本中，作者系统梳理了鲁迅的翻译工作、翻译作品、翻译主张以及翻译争议等等。此后直到1996年，公刘（1996）发表《是否需要重新评价鲁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再次以纪念鲁迅为切口，介入鲁迅接受史的争议场域。文中围绕梁实秋对鲁迅“一生坎坷”故“有一股怨恨之气”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主张”的批评展开，对鲁迅书写的“战斗性”进行重新审视，并在文末发问：“暗流如涌，是否需要重新评价鲁迅？”鲁迅

在周年纪念悼文所形成的周期性讨论中不断重塑并强化了社会群体对其本身以及社会历史的记忆与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其已然成为跨越时段并穿透意识形态更替的文化争夺对象。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周年纪念悼文并非旨在对逝者进行简单的重现，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断面上以新的文化意识更新逝者的文化身份与社会集体记忆。在战争、革命、新中国成立乃至世纪转折之际，鲁迅在纪念性悼文中被不断召唤回归，其意义被置换、争夺、升华，其悼文则成为政治文化情境与社会集体心理的载体。正如公刘所言，悼文总是“颇带盖棺定论的性质”（公刘，1996），而周年纪念悼文的意义正在于从不“钉死”这层棺木，以保持对逝者进行意义阐释的开放性。时间流动不息，记忆变动不居，逝者的身份也在社会变化间重塑。在持续唤回的过程中，逝者被不断写入集体身份的核心，而悼文正是这种记忆政治中最具穿透力和决定性的文本形式之一。

在社会集体记忆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属于个人的记忆需要安置，香港报纸中同样广泛存在的“私人悼文”意义正在于此。与前文的“非即时性悼文”不同，“私人悼文”不追求在对逝者进行身份上的建构，而只是通过私人回忆中各种琐碎而富有质感的细节，安放作者自身难以归类的情感。这些文章中的被悼者，通常是主流社会的记忆结构中容易被忽略的边缘人物，他们的存在或许并未直接之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影响，但对其展开哀悼的“私人悼文”的存在却时刻做着一种重要的警示，它提示社会与作为公共语境的报刊媒介，在其必然关注的典范人物和重大事件之外，还应持续为微观的个体记忆保留言说的途径。而综观香港报刊中广泛的“私人悼文”文本，一种“怀旧”（nostalgia）的情感成为其主要驱动力。此处所谓的“怀旧”，远非简单字面上对于过去人事物的缅怀，俄裔美籍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将其系统性界定为一种在现代性断裂中生成的时间情感结构，是对当前失落生活状态的情感回应与象征性修复。她在其中进一步区分“恢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两种类型，前者试图重建昔日秩序，强调“复原”，后者则对逝去经验进行内省性追忆与美学转化，并且往往是个人化的（Boym, 2001）。在本部分所讨论的“私人悼文”研究语境中，其怀旧因素显著呈现为后者。可以看到，这些“私人悼文”不希图自身进入历史或介入宏大，而只是在意识到死亡之断裂无法弥补的前提下，以个人化、碎片化的方式，回应逝者已去带来的情感真空。博伊姆针对“反思型怀旧”的情感结构强调，其“是一种深层哀悼的形式，通过深思的痛苦，也通过指向未来发挥悲痛的作用”。明华（1967）写下《悼爸爸》一文，以复杂的情绪反写父亲形象，直面与父亲长久以来的紧张关系，抱怨隔膜，却又无奈“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永远不会阻止我们了”感叹“我的爸爸啊！为什么你死后，我才觉得你好呢？”，亦有老师哀悼自己因病逝世的学生，化名多难（1966）的老师写下《悼汝霞——我的学生》追忆与学生周汝霞短短一年师生缘分中的温情瞬间。文章将悼念聚焦于各种细节，文末作者注视汝霞离去一直后空缺的座位，以脑中回荡的她可爱的声音做结，令人感动。怀谷（1992）的《悼父亲》则以父亲失约一同赏花的埋怨引出哀悼，将生活的温度与死亡的冷冽并置，于悲痛中回忆父亲去世的过程。笔名Wesleyman（2008）的作者则写下《断三——悼亡友子健》以诗悼友，在高度碎片化的感知与情绪片段中缅怀逝去的友人。文本的悼念并未诉诸生平事实的追述，而是转而沉入记忆的私密缝隙。诗人在此之间模糊现实与回忆的界限，只是保留那些“说不清的话”。诗中布满支离破碎的场景，却又以此构成温度与重量。在全诗最后，作者说“我们都在疯狂消瘦/不都像菊在低低的枝上摇呀摇/而像玫瑰一样铿锵/带着硬的刺划破无害的风”，既对友人展开悼惜，又隐约回旋了一种对自我命运的照见。

在以上个人而碎片化的怀旧性叙事之外，须知博伊姆还谈及“怀旧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某种中介。集体记忆可以被看成多重个人记忆的一个运动场，而不是一个墓园”（Boym, 2001）。换言之，个人对过去的回忆并非孤立地发生着，而是共存于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中，集体记忆也并非静态，其中更是有着无数的私人记忆在相互交流，而在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之间起到持续不断沟通作用的，正是“怀旧”的情感结构。蒿蔚（1970）的《悼曾牛三父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正构成这样一种私人记忆向社会集体记忆的过渡。该文为信件体，但并无收信人，其悼念作为社会边缘个体的养蚝人，但是最终归于港人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游移。在死亡的断裂与港人身份的断裂之间，在对于养蚝人的私人记忆与社会的集体记忆之间，充满着失落的“怀旧”情感发挥着其隐秘的联结作用。因此可以说，“私人悼文”中的“反思型怀旧”特征使其不局限于个体化书写的内向性，而更可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张力化叙事——其哀悼行为并不宏大，也不典范，却能不断生成源于集体记忆而不止于集体记忆的叙事内容。在具有后殖民色彩的香港文学语境中，这种由私人记忆构成的怀旧性叙事，成为对既定历史秩序与主流文化叙事的柔性抗衡，也为那些无法被制度性记录所容纳的生命、情感与地方性提供了位置。

三、继承：作为逝者遗产梳理及评价的悼文

前文所述“记忆”的维度关注个体消亡后进入集体叙述所经历的身份重塑与情感怀旧性联结，而在“继承”的维度下，悼文将再度指涉前文这样的“记忆”，并主要是其中的集体性记忆，引导其进入更后续的文化生产与社会价值系统。因而在这一维度下，悼文已然成为衡量逝者影响力、确定其象征地位的重要文本场域。换言之，“继承”首先必然涉及逝者身份的再建构与社会集体记忆的塑造，这与“记忆”维度形成重合，此后通过亡者遗产的梳理与阐释，推动特定文化知识传统的延续。在香港报纸文艺副刊的悼文中，针对个体学术以及社会成就的梳理是“继承”维度的核心实践。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断裂”中所提到的，一类悼文通过学术化、理论化的叙述策略进行对逝者的纪念，悼文也由此在哀悼之外加入了知识性的归档评价功能，应当说，是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作为遗产整理的悼文关乎继承，也“为世界可能的复魅做出了贡献”（Fowler, 2015, p.137）。杜变连（1997）《悼念诗人王佐良》一文体现出这类文本的典型逻辑。文章以王佐良的写作与翻译工作为主线展开，虽略有穿插作者与其交往片段的回忆，但并非构成文本的叙述重点，整体结构更侧重于对王佐良诗歌风格、文学批评立场及翻译实践的梳理与评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末还附王佐良一首诗作《巴黎码头边》，不仅使其创作作为延续引入悼文，也使得文本的悼念行为具备了象征性的文本维度：通过一种世事迷离、变幻轮回的诗中之义，悼念达成借诗寄意，使哀悼与作品共同构成对逝者的最终回应。韦君宜（1963）的《悼李劫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一文以李劫人最具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与《大波》为叙述主线，依托文本脉络建构起对其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整体性概览。文章通过作品的串联，有效勾勒出李劫人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其文学风格与社会关怀，完成了对其文学人生的有力提炼。其结构清晰，纪念与评价并重，在悼念的语境中实现了对李劫人文学遗产的回顾与定位。这类具有学术与理论梳理视野的悼文常具有一个显著的文本结构，即其不仅仅关乎逝者的生命呈现，更隐含着对于未来的开放、延续态度。在这样的文本结构上，个体的死亡虽然构成其自身的终结，却恰恰也在自身

的断裂处呼唤了他者的介入，也即一种“该跑的路跑尽了，还是留给同僚们接力吧”（何建宗，1993）的接续意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报纸文艺副刊中悼文的书写对象并不局限于本地或华人群体的语境，其哀悼对象同样涵盖了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家与政治文化人物，由此显示出这些副刊悼文文本在文化继承层面上的开放性与跨地域性。如马森（1993）的《悼荒谬剧大师尤乃斯柯》一文详细介绍了尤乃斯柯的生平经历与创作轨迹，并围绕其“荒谬剧”概念与存在主义的思想背景展开系统阐释，显现出文本高度知识化的写作姿态与文化整理功能。易水（1950）撰写的《文坛巨星的陨落——悼卡穆》则结合加缪一生的文学与政治活动，简述其代表作《鼠疫》并借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感叹“他死得太早了，我们正等着他的第二部作品”对其未竟之业致以吊唁。这类悼文在副刊中并不罕见，还有如《近代欧洲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刘湘池（1965）的《悼一代诗圣T·S·艾略特》，尤其（1958）的《悼日本作家德永直》、苓莎（1961）的《悼海明威》等等，均通过人物作品回顾与思想梳理，完成对外国文学传统的引介与价值确认。此外，亦有部分悼文涉及了重要政治人物的书写，如茅盾（1956）的《悼亚·法捷耶夫——文艺战士与和平战士》等，更将悼念置于更宏观的意识形态或国际政治语境之中。应当是，这一类针对外国人士的纪念悼文，体现着副刊作为一种香港的文化空间在“继承”维度上的双重意涵，其一方面通过跨文化文本的译介与整理，参与全球文学遗产的在地化接受；另一方面，它也使这些悼文自身成为了一个联结本地与世界，以及记忆再生产之间的中介形式，最终呈现出香港文艺副刊悼文在文化继承上的广阔性、知识性与多源性。

但与此同时，悼文所承担的“继承”维度也有着风险。政治化、商业化以及一种传统中“死者为大”的文化倾向的影响时刻存在，从而导致部分悼文存在着评价失衡、言辞失实等问题。孙绍振（1994）就曾以秦牧去世的一系列悼文为引，撰文《悼念文章最忌虚假吹捧》予以批评。其以张放发表于《文艺报》的《秦牧病逝后的省思》为例，指出其在评价中存在明显的拔高之嫌，尤其是他在文中将秦牧的《艺海拾贝》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作品”这一说法，缺乏足够的文学史依据，具有明显的夸饰倾向。文章进一步从文艺理论角度分析了张放对于秦牧散文成就的溢美之辞，认为其未能保持应有的批评距离。这类现象时刻警示着，悼文作为一种深刻参与文化记忆与评价机制的文本形态，不仅是遗产“继承”的媒介，更是权力结构与情感伦理共谋之下的再生产空间。因此，如何在悼念中实现真实与节制的评价，始终构成这一维度下的核心困境。此外，当关于逝者的“记忆”被遗产的“继承”整理所代替，逝者个体也可能面临着被简化，乃至工具化的可能。单薄的继承性悼念文本极易将逝者还原为某一价值体系中的代表性符号，而在此意义上，个体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存在的具体性就将被压缩为死板的资源。如此一来，如若放弃个体记忆而使其让位于纯粹的文化功能，悼文就可能沦为意识形态或学术体制内的工具性叙述。这样一种失当的位移，亦是悼文在“继承”的维度中不可忽视的悖论。

结语

作为一种回应死亡的叙事实践，悼文不仅构成私人情感的文字出口，更在报刊这种特定媒介的场域中折射着社会文化、个体身份与集体记忆的复杂面向。本文以上聚焦于香港报纸文艺副刊中的悼文书写，勾勒出其哀悼叙事的三重面向。在死亡所带来的“断裂”中，悼文以不同的叙事策略试

图弥合、维持、悬置或消解这种终结性的经验；与此同时，悼文还从集体与个人两个层面成为编织社会“记忆”的重要形式；而在文本的“继承”维度中，悼文进一步承担了社会文化的归档功能，使逝者的思想遗产得以进入延续的链条。更重要的是，这三重面向并非静态而相互区隔的，它们共同在“香港”这一特殊的地域语境中形成复杂的互构关系。悼文在此既体现出文化位置的中介性，又包容多元身份的交织与差异。哀悼因此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终结的感知，更成为一场与“断裂”周旋、进行“记忆”争夺、“继承”遗产以面向未来的文学回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22&ZD276）之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Yu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3855-3711>

Pei Ziju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7672-5825>

Reference

博伊姆·斯（2010）：《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

[Boym, S. (2010):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translated by Yang Deyou. Yilin Press.]

碧野（1940年3月27日）：“悼叶紫”，《大公报·文艺》，第806期。

[Bi Ye (1940, March 27). “Mourning Ye Zi.”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806.]

陈畸（1940年10月23日）：“纪念鲁迅四周年忌”，《大公报·文艺》，第953期。

[Chen Ji (1940, October 23). “Commemorating the 4th Anniversary of Lu Xun’s Death.”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953.]

陈思和（1996年3月20日）：“世纪末文坛上的流星——悼念林耀德”，《大公报·文学》，第193期。

[Chen Sihe (1996, March 20). “A Meteor in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Literary World: In Memory of Lin Yaode.”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193.]

杜变连（1997年4月23日）：“悼念诗人王佐良”，《大公报·文学》，第250期。

[Du Bianlian (1997, April 23). “In Memory of Poet Wang Zuoliang.”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250]

多难（1966年3月25日）：“悼汝霞——我的学生”，《中国学生周报》，第714期。

[Duo Nan (1966, March 25). “Mourning Ruxia: My Student.”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714.]

Fowler, B. (2015). “The 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Obituaries of Academics.” In Dawson, M. & Fowler, B(Eds.), *Stretch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Eldridg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20-140.

公刘（1996年11月6日）：“是否需要重新评价鲁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大公报·文学》，第226期。

[Gong Liu (1996, November 6). “Does Lu Xun Need Re-Evaluation?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Lu Xun’s Death.”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226.]

蒿蔚（1970年10月16日）：“悼曾牛三父子，以及”，《中国学生周报》，第952期。

[Hao Wei (1970, October 16). “Mourning Zeng Niusan Father and Son, and Others.”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952.]

何建宗（1993年10月24日）：“悼蕴盈博士”，《华侨日报·文廊》，第51期。

[He Jianzong (1993, October 24). “Mourning Dr. Yun Ying.” *Overseas Chinese Daily - Literary Corridor*, Issue 51.]

怀谷（1992年6月22日）：“悼父亲”，《星岛日报·文艺气象》。

[Huai Gu (1992, June 22). “Mourning my father.” *Sing Tao Daily - Literary Weather*.]

黄德伟（1993年10月20日）：“悼顾城或也是悼诗”，《大公报·文学》，第69期。

[Huang Dewei (1993, October 20). “Mourning Gu Cheng or Perhaps Also Mourning Poetry.”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69.]

黄伟健（1995年4月30日，5月7日）：“怀念父亲黄作梅（上）（下）”，《文汇报·文艺》，第882-883期。

[Huang Weijian (1995, April 30; May 7). “Remembering My Father Huang Zuomei (Parts 1 & 2).”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882-883.]

贾丹华（1996年6月16日）：“怀念诗坛泰斗艾青”，《大公报·文艺》，第940期。

[Jia Danhua (1996, June 16). “Remembering the Poetry Master Ai Qing.”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940.]

苓莎（1961年8月25日）：“悼海明威”，《香港时报·浅水湾》。

[Ling Sha (1961, August 25). “Mourning Hemingway.” *Hong Kong Times - Repulse Bay*.]

林林（2000年8月31日）：“怀念冯乃超”，《大公报·文学》，第424期。

[Lin Lin (2000, August 31). “Remembering Feng Naichao.”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424.]

刘湘池（1965年1月15日）：“悼一代诗圣T·S·艾略特”，《中国学生周报》，第652期。

[Liu Xiangchi (1965, January 15). “Mourning the Great Poet T.S. Eliot.”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424.]

陆离（1969年10月24日）：“敬悼左舜生先生”，《中国学生周报》，第901期。

[Lu Li (1969, October 24). “Respectfully Mourning Mr. Zuo Shunsheng.”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901.]

罗高（1940年10月19日）：“中国的圣人——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公报·文艺》，第950期。

[Luo Gao (1940, October 19). “China’s Sage: Commemorating the 4th Anniversary of Lu Xun’s Death.”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950.]

马森（1994年5月15日）：“悼荒谬剧大师尤乃斯柯”，《华侨日报·文廊》，第79期。

[Ma Sen (1994, May 15). “Mourning the Master of Absurd Theater Ionesco.” *Overseas Chinese Daily - Literary Corridor*, Issue 79.]

Martin, J. (2022). “Rhetoric, Death,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05): 477-490.

明华（1967年4月7日）：“悼爸爸”，《中国学生周报》，第768期。

[Ming Hua (1967, April 7). “Mourning father.”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768.]

茅盾（1956年6月13日）：“悼亚·法捷耶夫——文艺战士与和平战士”，《文汇报·文艺》。

[Mao Dun (1956, June 13). “Mourning Fadeyev: A Warrior of Literature and Peace.”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区肇龙（2022）：“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报业”，《媒介批评》（01）：251-274。

[Ou Zhaolong. (2022). “Jin Yong’s Novels and Hong Kong Journalism in the 1950s.” *Media Criticism* (01): 251-274.]

破空（1994年10月19日）：“人民心灵的救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公报·文艺》，第110期。

[Po Kong (1994, October 19). “The Savior of People’s Souls—In Commemoration of the Thirteenth Anniversary of Mr. Lu Xun’s Death.”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Issue 110.]

孙绍振（1994年3月13日）：“悼念文章最忌虚假吹捧”，《华侨日报·文廊》，第70期。

[Sun Shaozhen (1994, March 13). “The Worst Flaw in Memorial Articles is False Flattery.” *Overseas Chinese Daily - Literary Corridor*, Issue 70.]

陶东风（2010）：“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国图书评论》（09）：69-74。

[Tao Dongfeng. (2010). “Memory a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na Book Review* (09): 69-74.]

王健（1939年10月18日）：“纪念鲁迅与提倡杂文”，《星岛日报·星座》，第427期。

[Wang Jian (1939, October 18). “Commemorating Lu Xun and Promoting Essays.” *Sing Tao Daily - Constellation*, Issue 427.]

韦君宜（1963年1月23日）：“悼李劫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文汇报·文艺》。

[Wei Junyi (1963, January 23). “Mourning Li Jieren: A Realist Writer.”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Wesleyman（2008年9月12日）：“断三——悼亡友子健”，《文汇报·新创线》。

[Wesleyman (2008, September 12). “Breaking Three: Mourning My Friend Zijian.” *Wen Wei Po - New Creative Line.*]

徐铸成（1941年9月26日）：“悼念季鸾先生”，《大公报·文艺》，第1190期。

[Xu Zhucheng (1941, September 26). “Mourning Mr. Ji Luan.”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1190.]

羊城（1993年12月1日）：“生命的边缘行车——悼谢烨”，《大公报·文学版》，第75期。

[Yang Cheng (1993, December 1). “Driving on the Edge of Life: Mourning Xie Ye.”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Edition*, Issue 75.]

尤其（1958年2月22日）：“悼日本作家德永直”，《文汇报·文艺》。

[You Qi (1958, February 22). “Mourning Japanese writer Tokunaga Sunao.”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易水（1950年2月12日）：“文坛巨星的陨落——悼卡穆”，《中国学生周报》，第395期。

[Yi Shui (1950, February 12). “The Fall of a Literary Giant: Mourning Camus.”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ssue 395.]

庄约（1939年10月20日）：“遥祭——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公报·文艺》。

[Zhuang Yue (1939, October 20). “Distant Memorial: The 3rd Anniversary of Lu Xun’s Death.”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邹荻帆（1948年10月18日）：“跨过阿Q——纪念鲁迅”，《大公报·文艺》，第32期。

[Zou Difan (1948, October 18). “Crossing Ah Q: Commemorating Lu Xun.”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and Art*, Issue 32.]

周晓坤（2023）：“中国现当代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东岳论丛》（06）：52-60。

[Zhou Xiaokun. (2023). “The Dialectics of Life and Death a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Memorial Essays.” *Dongyue Tribune* (06): 52-60.]